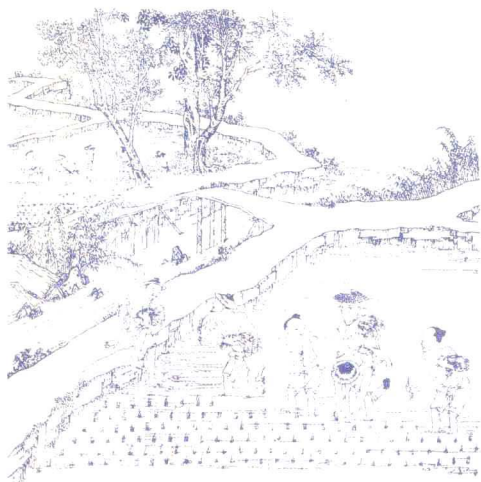


〔日〕加藤繁 著 吴杰 译

中国经济史考证

上



日本学者中国史研究丛刊

中华书局

〔日〕加藤繁著 吴杰译

中国经济史考证

上

日本学者中国史研究丛刊

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经济史考证 / (日) 加藤繁著; 吴杰
译. —北京: 中华书局, 2012.10
(日本学者中国史研究丛刊)
ISBN 978-7-101-08871-7

I. 中… II. ①加… ②吴… III. 中国经济史—
研究—古代 IV.F129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01792号

-
- 书 名 中国经济史考证(全二册)
著 者 [日] 加藤繁
译 者 吴 杰
丛 书 名 日本学者中国史研究丛刊
责任编辑 孙文颖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2年10月北京第1版
2012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规 格 开本/680×960毫米 1/16
印张67¼ 插页14 字数1170千字
印 数 1-2000册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08871-7
定 价 168.00元
-

出版说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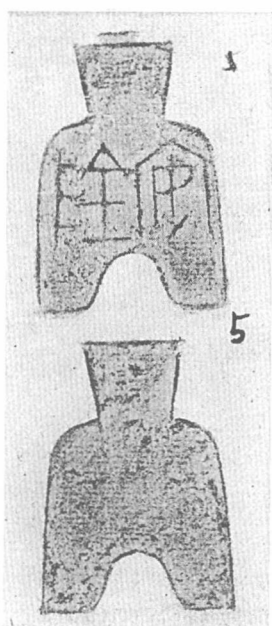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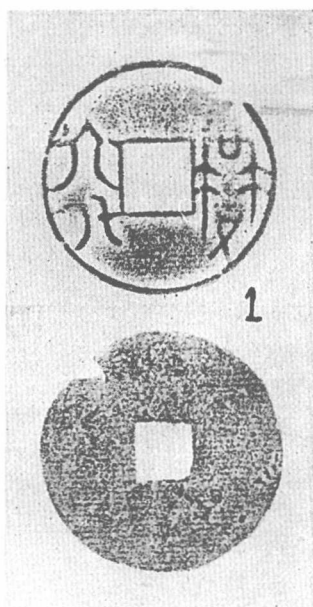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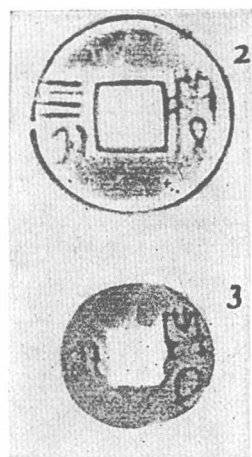
加藤繁(1880—1946),1906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中国史学科,文学博士,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。日本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。

《中国经济史考证》分为上卷(1952年)、下卷(1953年),作为“东洋文库论丛”第三十四种出版,收录论文58篇,上卷21篇,附录《中国古田制研究》1篇;下卷37篇,附录论文5篇。这些论文研究的年代,上至周景王,下至清末,基本涵盖有文献资料记载的中国古代经济史,具体研究论题主要集中在汉、唐、宋、清四朝,内容涉及汉代的财政制度,唐宋的庄园组织、都市和草市的发展,宋代的货币、商业、户口,清代的货币、财政、盐法、定期市等等。

原中译本系繁体横排,分三卷,分别于1959年、1963年和197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现改为简体横排,改正一些错讹之处,补全图片,依日文原版顺序编排,分上、下两册,收入“日本学者中国史研究丛刊”。

中华书局编辑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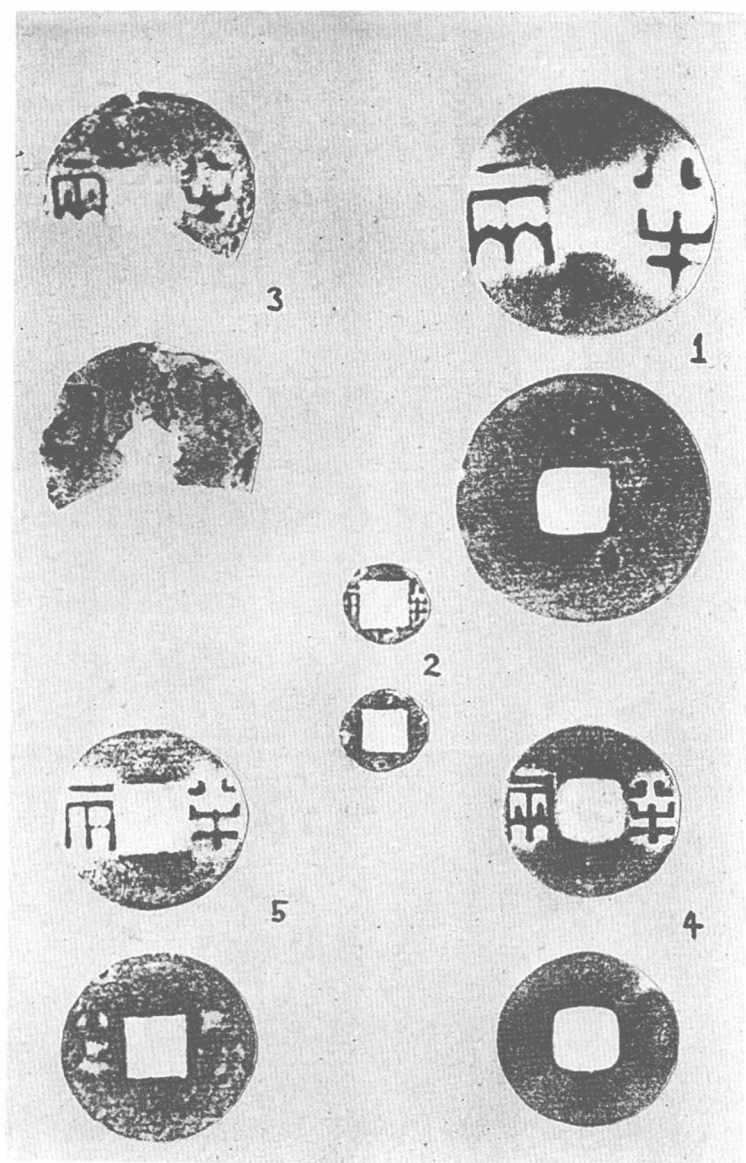
2012年8月



日本银行货币标本室藏

1. 𧇵六化 2. 𧇵四化 3. 𧇵化
4. 安阴布 (大) (圆肩) 5. 安阴布 (小) (圆肩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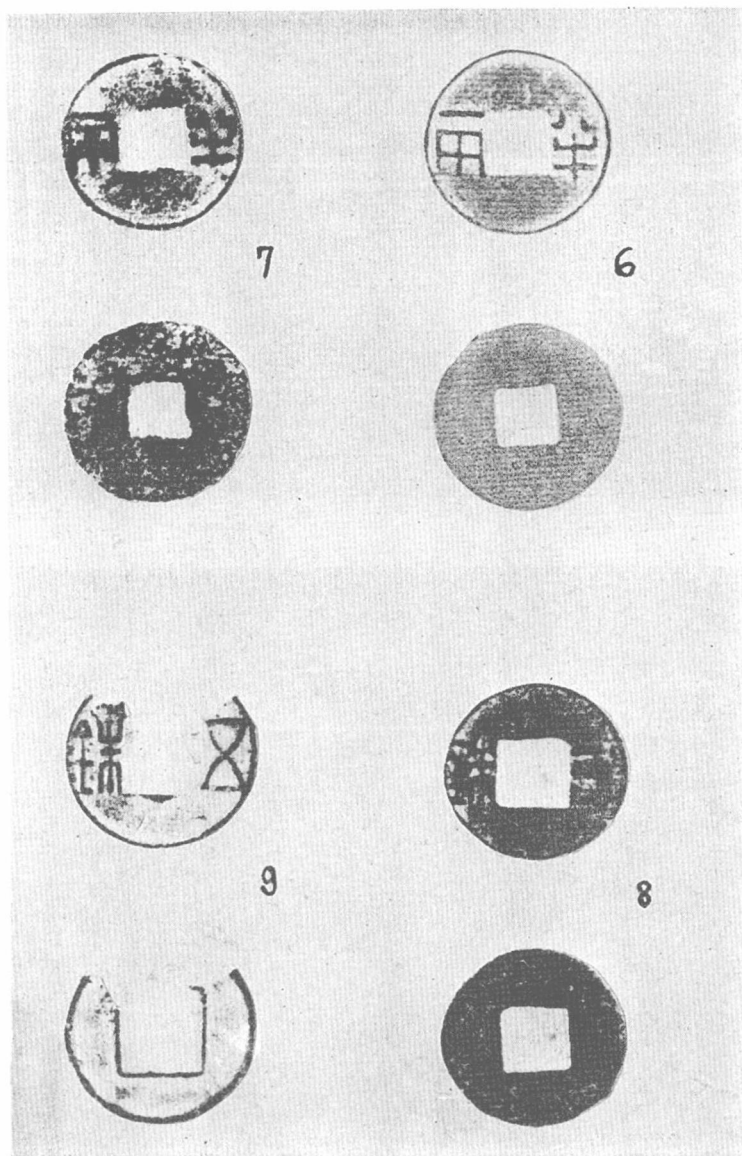
(参照《周景王铸钱传说批判》)



2. 1.
3.
4.
5.

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
日本银行货币标本室藏

1. 秦半两钱 (乙) 2. 榆莢钱 3. 八铢钱 (丁)
4. 四铢钱 (甲) (入字) 5. 四铢钱 (乙) (十字)
(参照《关于西汉前期的货币特别是四铢钱》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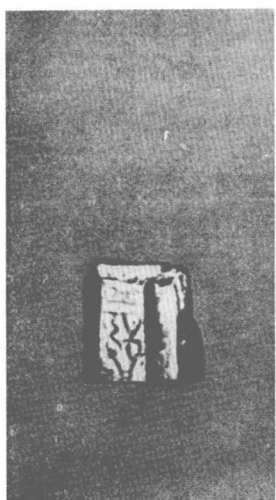


6. 7.
8. 8.
9. 9.
日本银行货币标本室藏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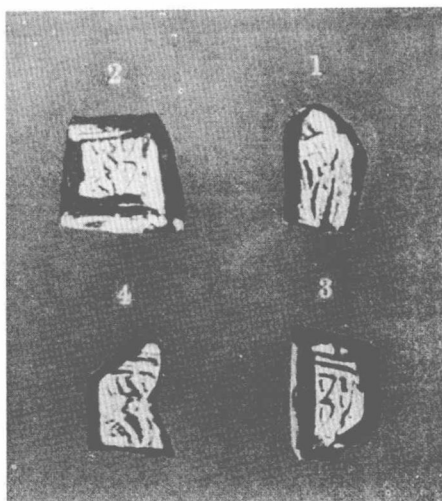
6. 有郭四铢（十字） 7. 有郭四铢（乙）（入字） 8. 三铢钱（甲） 9. 五铢钱（丁）

（均系汉武帝时代前期铸造者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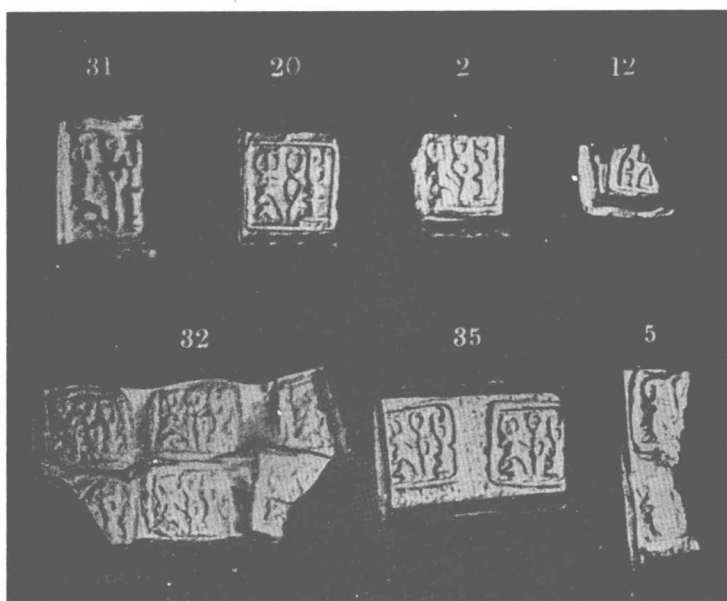
（参照《关于西汉前期的货币特别是四铢钱》以及《三铢钱铸造年分考》）



方氏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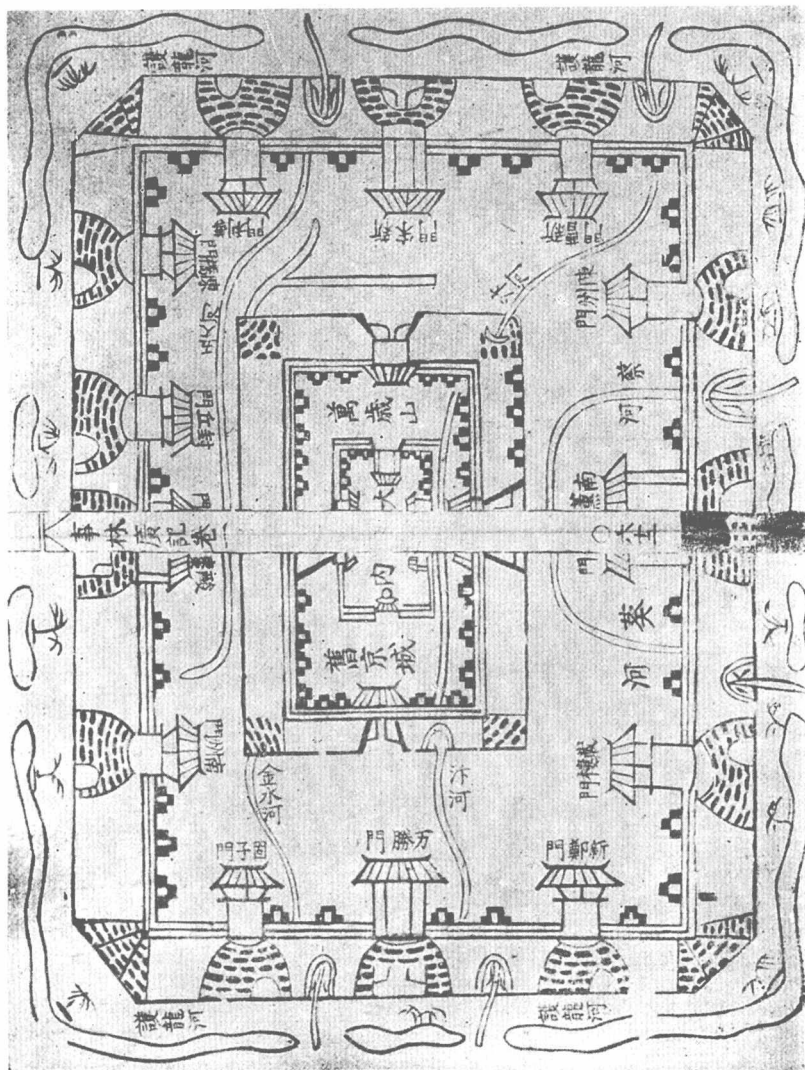


罗氏藏



三井家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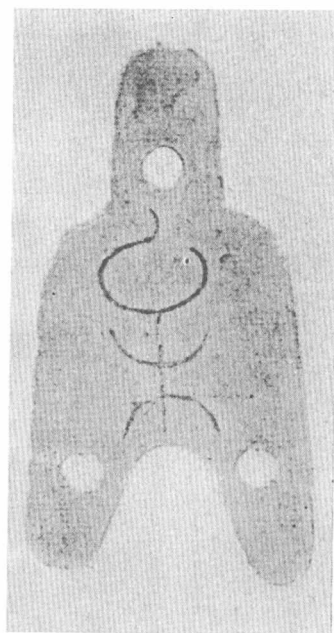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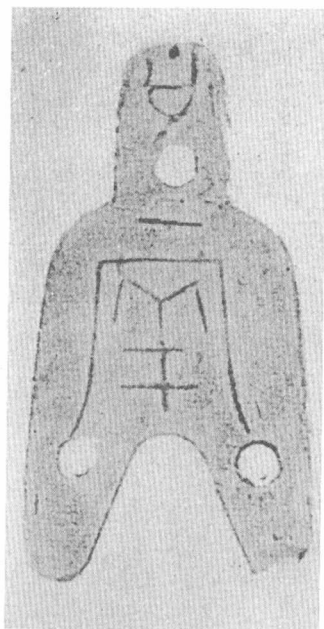
(参照《郢爱考》)



宋京城外城之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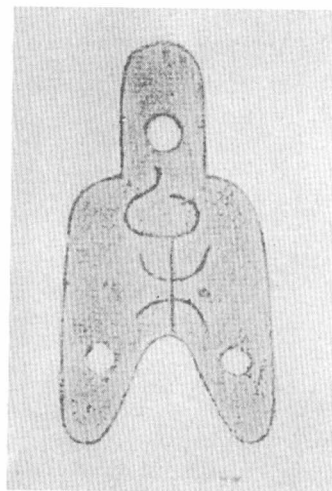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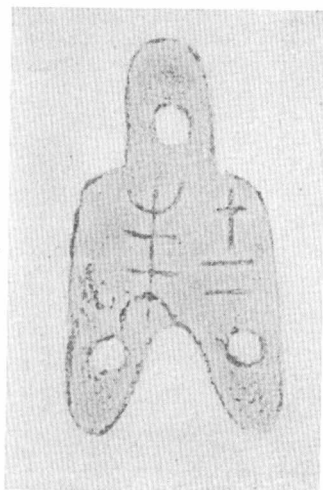
(参照《宋代都市的发展》)

糸布(两)



同(十二铢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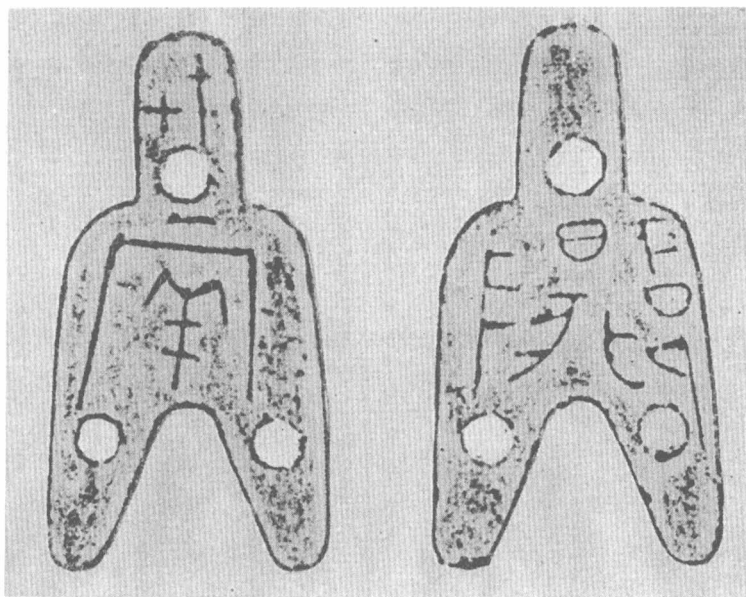
日本银行货币标本室藏



(参照《周景王铸钱传说批判》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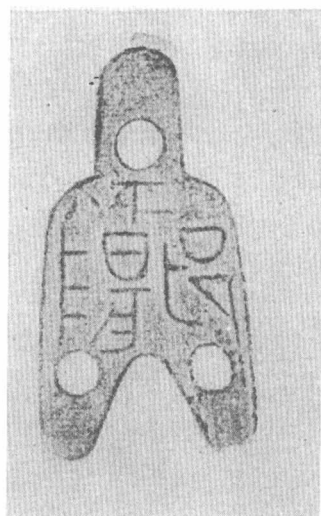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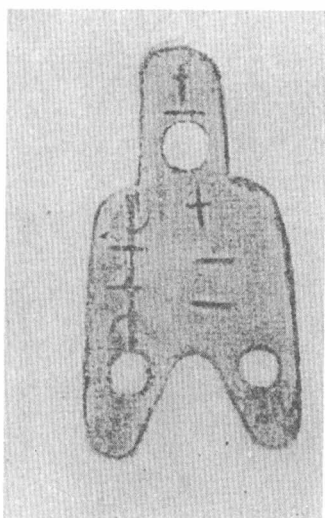
下阳人邑布(两)

据《东亚钱志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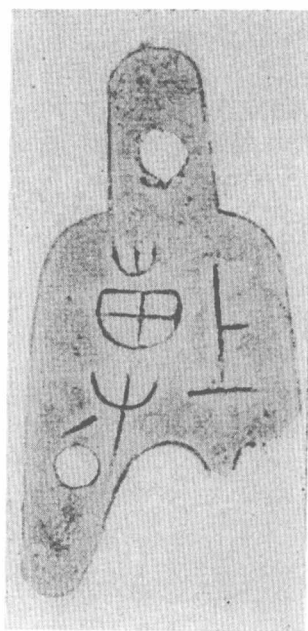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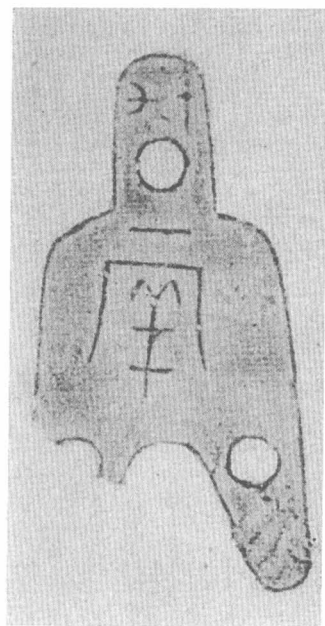
同(十二铢)

日本银行货币标本室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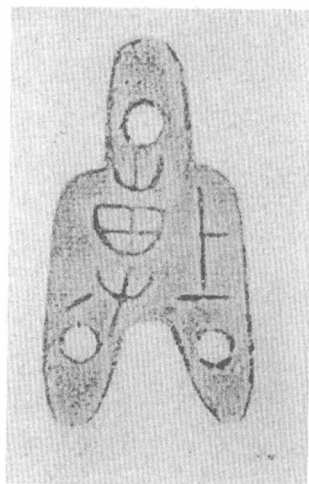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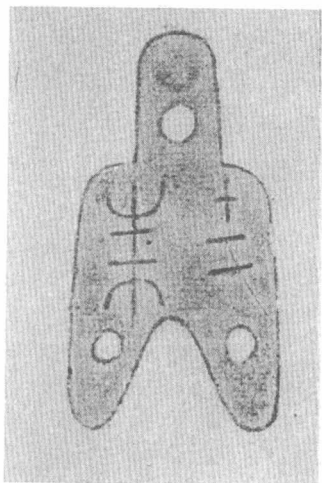
(参照《周景王铸钱传说批判》)

上 尊布 (两)



同 (十二铢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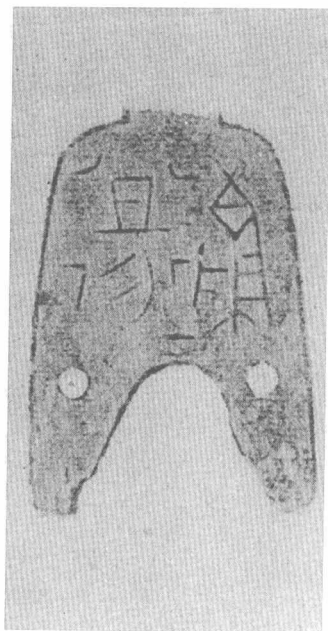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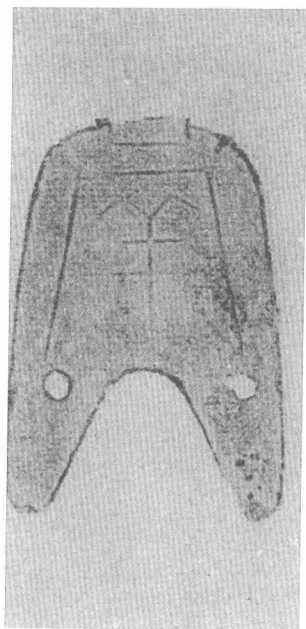
日本银行货币标本室藏



(参照《周景王铸钱传说批判》)

图版第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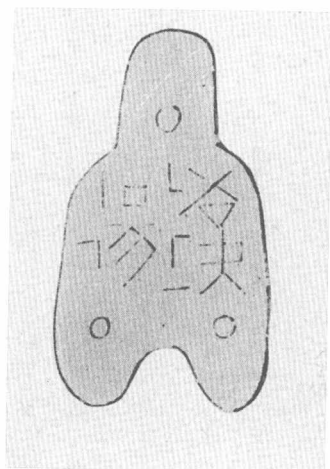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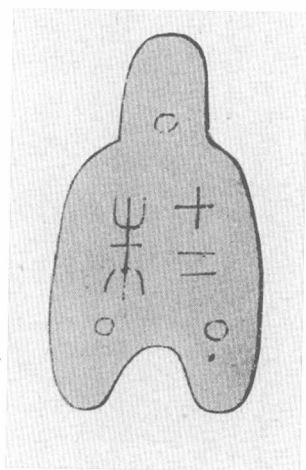
衡阳布(两)



同(十二铢)

据《古泉汇》

日本银行货币标本室藏



(参照《周景王铸钱传说批判》)

加藤繁与《中国经济史考证》

韩昇

加藤繁(1880—1946)是中国几代学者都十分熟悉的名字,他的论文早在 20 世纪前叶就陆续翻译介绍到中国,大家都知道他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开拓性研究,使得中国经济史成为日本史学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,而他的名字也就同这个学科紧紧联系在一起。日本学者关注加藤繁的研究,中国学者也不曾忽视过。1952 年,他的《中国经济史考证》在日本艰难出版后不久,吴杰就着手进行翻译,中译本分成三卷,分别在 1959 年、1963 年和 1973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祖国宝岛台湾的华世出版社也作了翻印。至于另一部给加藤繁带来莫大荣誉的著作《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——以金银之货币机能为中心》,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在 1944 年就组织人员翻译印行中译本,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在 1974 年重印,中华书局也在 2006 年重版。这两部著作是加藤繁四十余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双璧,成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的必读之作。



加藤繁 1880 年出生于日本松江的武士家庭,父亲内田虎次郎是松江藩属臣三谷权太夫的家宰,虽然秩禄不太高,却属于日本社会中士农工商四阶层之士族门第,在等级社会里颇感自豪。加藤繁 2 岁时,出继给松江藩士族加藤文八。其时,明治维新早已成功,武士不但在政治上没落,家庭也陷入经济窘境。加藤繁的生父内田虎次郎只能沽酒谋生,养父加藤文八则充任狱警。所以,士族门第并没有给加藤繁带来政治和经济的特权,所能给予他的恐怕只是社会优越感和良好的教育。

在日本,旧门第虽然已经被彻底打破了。但是,社会上乃至人们的观念中,依然对旧门第怀有某种仰慕。士族出身者自然带有与生俱来的优越感,这种优越感对于其后来的人生成长或许成为包袱,或许转化为自我的激励。加藤繁显然属于后者。至于教育方面,一是家庭环境的熏陶,如内田家颇有艺术修养,影响了加藤繁终生喜好绘画。二是汉学教育。江户幕府时代,是日本汉学的又一高峰期,特别是该时期的汉学深受清朝“乾嘉考据学”的影响,强调经世致用,儒史结合,实学唯重,故世家子皆具汉学修养,引以为荣。子弟自幼即受熏染,加藤繁后来选择研究中国,与此颇有关系。其养父虽然不是个学问家,却从小教他诵读《四书》、《孝经》,打下汉学根基。故加藤繁小时候就对汉学怀抱兴趣,在中学时期,用一年左右的时间,句读《十八史略》和《史记》。汉学根基是日本近现代中国学研究的一大长处。江户幕府时代以来,日本学者能写流利的汉文、汉诗,亦善书法,其教育与中国颇有相同的一面。近代西学传入之后,汉学不曾废弃,故明治维新后成长起来的学者,汉学亦精。此传统至少延续至 20 世纪前叶出生的学者身上,我同这批学者广泛接触,也翻译了不少他们的学术论著,让我印象最深的与其说是西学理论,不如说是汉学根基。以西学规范,做汉学实证,是我对他们的基本认识。此传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为改变,蒙学彻底终结,汉字汉文都是在学校现代语文课程中接触学习的,传统的字义训诂的训练没有了,故此后

的学者对于古代汉文的理解,与战前学者有着明显的差异。这是理解日本当代中国学研究时必须注意的方面。

加藤繁这一代学者,知识体系是在以蒙学为基础的汉学环境下建立起来的。至于他为什么选择研究中国,进而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,则出自两个看似偶然的原因。

第一,中学时代,加藤繁曾经沉迷于小说和绘画,一时学习成绩急剧退步,受到老师和父亲的斥责,令他重新思考学习志向。此时,他读到了三宅雪岭《真善美日本人》一文,其中谈到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宏远伟大,要做一个真善美的日本人,首先应该深入了解中国悠久的文明史。加藤繁深以为然,遂选择了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方向。

第二,中学毕业后的加藤繁,为求学来到东京。1901年进入国民英学会学习,翌年夏季毕业。秋季考上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学科。^①从家庭经济情况考虑,加藤繁选择了不通过“高等学校”^②而直接进入专业学习的“选科”,这样可以提前毕业,早日参加工作。当然,加藤繁也为此付出代价,在毕业时未能获得文学士学位。这时的东京大学废除以往的推荐制,学生必须提交论文申请毕业。1902年10月,内田银藏等人成为东大第一批通过论文获得学士学位的毕业生。这刚好是加藤繁进入东京大学不久后的事情,引起他的高度关注。他阅读了内田氏的论文,这是一篇研究日本古代土地制度史的专论,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。这时期,他还阅读了若干研究英国经济史的著作,感到中国古代经济史是一个尚未开拓的领域,暗下决心进行这方面的尝试。这个决定,使他和中国古代经济史结下了40多年的缘分。

1906年3月,加藤繁完成了毕业论文《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》,于7月顺利毕业。这篇论文,从1911年到1912年在日本史学界最为重要的学术杂志

① 亦即今日东京大学文学部。东京大学早期学科设置颇继承旧学规范,有汉学科,下设史学部,内有中国历史方向。至明治37年(1904),依西方学科规范改制,设立哲学、史学和文学三大学科,史学科内含中国史学方向。

② 日语中的“高等学校”,在1948年以后指的是高中。但是,在此之前,“高等学校”乃大学初级教育,学制3年。

《史学杂志》上连载。显然，他的研究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并引起重视。

毕业后的加藤繁受聘担任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管理科副主任，兼任法政大学预科讲师，讲授汉文学。1907年11月，加藤繁转到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工作。该会的事务所设置在京都帝国大学法科大学（即今法学部）内，加藤繁负责调查清朝土地制度、产业和货币等问题。

1915年，台湾旧惯调查会解散，加藤繁迁居和歌山县和歌浦海滨，在这里住了两年，重新研究起中国经济史来。1916年，他完成了《古田制的研究》一书，同年8月由京都法学会出版。这时，他把眼光从田制史转移到财政史，其研究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。

在此期间，加藤繁仔细研读了清代学者王先谦的《汉书补注》，撰写了重要论文《汉代的国家财政与帝室财政的区别并论帝室财政之一斑》，连载于1918年至1919年的《东洋学报》。也就在这个时期，加藤繁意识到要研究财政史，必须详细了解货币史。后来，他回忆这段研究路程时说道：

在此期间，我稍微调查了土地制度，同时也研究汉代财政史。当时我以为经济史难以把握，应先研究财政史。这样可以弄清楚经济史料之所在等问题，心中有数，遂着手进行研究。这时我又意识到研究财政需要详悉货币，而货币之中金银（Ingot）问题却一向模糊不详，有必要先弄清楚，我就这样展开了金银的研究。

在进行此项研究过程中，对于经济史的大部分见解建立起来了，随着知识的不断吸收，以往的方针为之一变，决定先把财政史放一放（当然，财政史很重要，必须始终予以关注），大力推进经济史的研究。

（《通往经济史研究之路》）

也就是说，加藤繁原来计划以财政史为出发点，现在改变为从金银切入中国经济史研究，暂且将财政史搁置。

作出决定后，加藤繁就把全副精力投入这项研究之中。1917年，他受聘